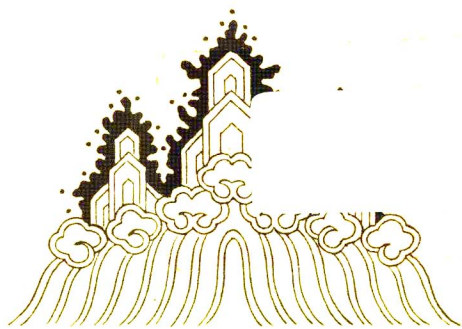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

李汉秋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安徽省全椒福爵房地产公司资助出版

《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

李汉秋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为纪念吴敬梓诞辰 310 周年而编撰的,供《儒林外史》高峰论坛开展学术研讨的论文集。全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重视《儒林外史》人文精神与当下意义的研究;二是发掘了新资料,推进了对吴敬梓家世和作品的研究;三是对《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传播接受及结构特征作了新的探讨;四是研究方法多元,论述角度多样,追求大胆质疑和学术创新。

本书适合对《儒林外史》及吴敬梓感兴趣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及相关研究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李汉秋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13-09490-2

I. ①儒… II. ①李… III. ①《儒林外史》—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0378 号

《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

李汉秋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34 字数:532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09490-2/I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71-85166701

《〈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

编委会

- 主任 李汉秋 盛必龙
- 副主任 陈文新 周月亮 周兴陆 刘勇强 朱万曙
吴波 谭帆 竺青 陆水旺
- 委员 李忠明 田胜林 张国风 顾鸣塘 杜贵晨
王平 胡益民 苗怀民 陆林 赵山林
胡胜 华德柱 刘红军 项东升 秦锦章
裘新江 金厚钧 王恽忠 王燕 石雷
- 主编 李汉秋
- 副主编 田胜林
- 秘书 宣扬

吳敬梓是中國古代史中一位
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
我們隆重紀念他誕辰三百一
十周年，並且相信對他的紀
念和研究將永存於中國
未來的文學史和思想史之
中。
寫於吳敬梓誕辰三百一十周
年前夕。孫家正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题词



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筹)常务理事集体合影

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个盛世——清代乾隆时期，出现了两部古典小说巅峰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中只有这两部被鲁迅认可为“伟大”。而胡适则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前辈权威的论断我们未必百分百接受，但它可以反映出《儒林外史》的崇高地位。吴敬梓以士人的心态为中心，探索生命的真精神，触及到人类及其社会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百代之下仍能引起深思者的共鸣。西方学者亨利·W·韦尔斯著的《论儒林外史》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其风格活泼生动，刻画中国文人及广泛社会众生相，实无出其右者。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

1935年，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里，针对某些人以为《儒林外史》“不永久，也不伟大”的看法，不无讽刺地发出深沉的感慨：

“伟大也要有人懂。”

斗转星移，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林外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已有长足的进展，懂得《儒林外史》伟大的人正在增多。

建国后，广大文学研究者努力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古典文学，使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1954年，北京举行“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在全国第一次掀起研究《儒林外史》的高潮，报刊上发表了约三十篇文章，确是开创了《儒林外史》研究的新局面，为之后的这项研究工作奠定下良好的基础，也对古典文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54年第一次盛会我来不及参加，翌年，我从导师吴组缃先生学

习,感受了它的巨大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古典文学研究逐步摆脱极左思潮的困扰,开始出现繁荣的征兆。此后的三次全国性《儒林外史》学术活动都举行于我在安徽大学任教期间:1980年我被选为安徽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伊始,就倡议并协同有关单位筹办了于1981年在安徽滁州举行的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学术讨论会,那是1954年之后的第一次,会后,我协助安徽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出版。1984年在江苏南京举行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儒林外史学会,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后,我为中华书局编了《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出版。1986年当全椒吴敬梓纪念馆建成之际,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与全椒合作举办了新时期第三次全国《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会后以我为责任主编,编辑了《儒林外史学刊》,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第四次全国《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则于1996年在扬州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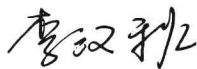
古典文学研究应当逐渐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开放体系。对各种有益的研究方法,应当兼容并蓄,吸收其长处,用以丰富发展我们的研究。新时期举行的前四次全国《儒林外交》学术讨论会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1981年第一次讨论会时运用美学分析取得显著成果;1984年第二次讨论会上出现了运用系统论等西方研究方法的尝试;1986年和1996年的第三、四次讨论会,是在“文化热”中举行的,文化学的眼光成为引人注目的特色。

1989年我调北京工作,希冀北京再办起纪念吴敬梓的活动。2001年是李白诞生1300周年、苏东坡逝世900周年、吴敬梓诞生300周年。在北京惟独吴敬梓,由全国政协、文化部、中国作协联合主办了纪念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城合肥由安徽大学主办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滁州市和全椒都举行了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从首都,到省会,到市县,范围之广,规格之高,都是空前的。我心想,我们总算为吴敬梓《儒林外史》尽了些微薄之力。

2001年侧重在纪念活动,未着力于学术。2011年纪念吴敬梓诞辰310年,我们着重在学术,由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筹)与全椒县委县政府合作举行学术研讨会,老中青三代学者近百位齐聚吴敬梓故

里。我们重组了学会组织,成立了新的儒林外史学会,展示和交流了新的学术成果。这是新世纪以来的《儒林外史》学术盛会,距上一次讨论会论文结集已有二十四年,可谓积久而发。何况这期间我们的文化经历着转型,对《儒林外史》所涉的许多文化现象,如儒家、科举制度、礼乐文明、孝道、仁义、贤人、程朱理学等等,都有了新的观照;对所涉资料有新发掘,对所涉文物有新发现。凡此种种都促成了新成果新水平。我们从参会论文中选出四十多篇结为此集,因主要反映新世纪以来的研究面貌,故名“研究新世纪”。作者也大多是新世纪以来的新人,他们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开辟着新世纪的道路,昭示着新世纪的前程。希望他们茁壮成长,队伍越来越壮大。

学术研究的长河奔流不息,说不尽的《儒林外史》必将有更多新的话语。我们的“研究新世纪”将追蹊浩荡的洪流,拍摄下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象,为振兴中华文化克尽微薄之力。



癸巳春于北京中华民族园西

目 录

功利心必须调节——《儒林外史》启迪之一(李汉秋)	1
读《儒林外史》札记(齐裕焜)	11
《儒林外史》的空灵美(周月亮)	23
《儒林外史》与传统人文精神——论吴敬梓笔下的贤人及其人格 追求(陈文新 鲁小俊)	30
《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刘勇强)	40
斯人实有幸,不只稗说传——读《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孙 超 周兴陆)	61
《儒林外史》旧说新议三题(杜贵晨)	66
《儒林外史》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王 平)	79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儒林外史鉴赏辞典》构成对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的全面研究(段启明)	94
新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新成就与新趋向(甘宏伟)	96
吴敬梓家世“从龙”与“让袭”考(田胜林)	101
吴敬梓家世新探——读吴国缙《世书堂稿》(郑志良)	124
吴敬梓家世考(王恽忠)	141
《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新探(刘红军)	153
《儒林外史》有关科举事象之考释——乾隆十九年前的科考诗赋问题(井玉贵)	170
体制的束缚与人的超越——从吴敬梓与科举的决裂说开去(王运歌)	177
《儒林外史》人物杜慎卿本事考略——兼论吴敬梓与吴檠之关系(吕贤平)	184
论《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奇”(薛 莲)	196
家庭家族文化视野下论《儒林外史》(伍大福)	201
站在《儒林外史》的立场看《红楼梦》 ——从胡适先生扬《儒林外史》抑《红楼梦》说开去(陈文新 甘宏伟)	220
地域·人物·题旨:《儒林外史》结构新论——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叶楚炎)	231
论《儒林外史》对《水浒传》文法的仿拟(李桂奎 杜晓婷)	263

《儒林外史》传播与接受的环境研究(凌 松 顾鸣塘)	274
论《儒林外史》对唐人传奇豪侠形象的解构与颠覆(甘宏伟)	283
情节模式的沿袭与变形——以《儒林外史》中的“入赘”为例(叶楚炎)	291
试论叙事学视野中的《儒林外史》“戏曲因素插入”描写(李延年 张春贺)	306
公心讽世 委婉含蓄——论吴敬梓《儒林外史》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杨锦鸿)	324
美人一赋解人难——就《移家赋》注释问题与王步高、陶家康二先生商榷(项东升)	337
《儒林外史》的思想路径与当下意义(裘新江)	361
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教育思想(苏 立)	375
丑陋的读书人:被功名富贵扭曲的灵魂 ——论《儒林外史》中文人士阶层的异化人格与悲剧命运(张文杰)	381
此心安处是吾乡(吕贤平)	396
“士与女”理想的相处范式——《儒林外史》对夫妇人伦的思考(白金杰)	408
杜少卿:士人自足人格的理想形象(张平仁)	418
论《儒林外史》中婚丧描写的深层意蕴(邓秋颖)	425
从《儒林外史》的家庭生活描写看吴敬梓的婚恋观(庄 洁 华德柱)	439
失落与追寻——《儒林外史》思想情感探析(苗怀明)	450
陈批《儒林外史》校勘得失浅探(李延年)	459
胡适批点本《文木山房集》的学术价值发见(王思豪)	476
《儒林外史》札记二则(姜 胜 王 成)	486
《文木山房诗说》管窥(张 铉 王法贵)	491
自由的精神与批评的艺术——中国古典小说讽刺论纲要(陈惠琴)	498
附录一:宁宗一“吴敬梓诞辰 310 周年纪念大会暨《儒林外史》高峰论坛”贺信	505
附录二:吴敬梓诞辰 310 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儒林外史》高峰论坛综述	507
附录三: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组成人员名单	513
附录四:纪念吴敬梓诞辰 310 周年	517
编后记	530

功利心必须调节——《儒林外史》启迪之一

——纪念吴敬梓 310 年诞辰

李汉秋*

病象有历时性

《儒林外史》描摹人情世态惟妙惟肖，它所诟病的有些病象具有历时性。大抵同时代的卧闲草堂本评语（以下简称卧评）就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第三回）。“慎勿读”三字是反语，正强调了这部小说发聋震聩的认识作用。

到了清末，《儒林外史》评点家天目山樵“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刘咸炘《校讎述林》卷 4《小说裁论》）。他觉得身边茶馆的世界就是《儒林外史》所描摹的世界。

到了民国时期，著名小说家张天翼 1942 年写了一篇长文《读〈儒林外史〉》，他说：

这部书里的那些人物，老是使我怀念着，记挂着。他们于我太亲切了。只要一忆起他们，就不免联想到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些熟人……似乎觉得他们是我同时代的人。后来越想越糊涂，简直搅不清他们还是书中的人物，还是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了。

到了 1995 年，何满子为胡益民、周月亮所著《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写序，回忆 1980 年秋吴组缃先生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何满子接着说：“《儒林外史》

* 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儒林外史》研究专家。

不仅在当时，人读之‘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今天也还是。”

以上四个时期，社会制度的变更可谓大矣，《儒林外史》所诟病的某些人情世态为何都一直存在？

我们在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制度的时候，总是把一切不好现象归罪于旧制度所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非人）”；或者把负面现象总说成是旧思想（封建思想文化）的残余和影响。可是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百余年了，新社会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儒林外史》所诟病的许多现象还是存在，这就逼我们不能不思考：是否还有超越制度层面的人心人性深处的原因，在人类历史的可预见阶段是否还存在产生那些负面现象的条件和因素？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功利心失调会导致人性异化

在文化的三层面中，《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而是着意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到人心人性的深层，从而超越制度层面，超越时空，给人良多启迪。这是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儒林外史》的启迪可能有许多，本文仅窥一斑。

功利心就属于精神现象。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功利心不会也不该泯灭。但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就会使人性异化，使人文精神弱化，使文化变味。

功利，在传统社会的士林中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称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

马二先生是厚道好人，他的弱点就是举业的功利主义。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掩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成了应试教育的虔诚鼓吹手。《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深入下去，写到精神层面：马二的思想被戕害，智能被斫伤，人格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但他的人品还没有变坏，对功利的向往还没有失范失控。

如果把匡超人的堕落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生活真实也不符合作品实际。匡超人捧着马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之后，作品写“大柳庄

孝子事亲”，他孝事久病在床的父亲，十分尽心尽力，相当感人，对哥和嫂也克尽悌道。在伦理氛围很浓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并未因想走科举之路就变坏，他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博得县宰赏识。

自从来到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杭州，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开始目迷五色失去方向，失去定力。景兰江等斗方诗人教他通过写诗浪得虚名攀结上层的捷径，书坊为他提供了粗制滥造文化产品以牟利的通道，凭着乖巧他做得都很得手，功利心发展得很顺利。但在衙吏潘三看来那些勾当实利都太小，教唆这个进城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他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他怎样牟利呢：帮潘三假造公文，把青春年少的女性荷花拐卖了，不管荷花姑娘是否掉入火坑是死是活，他“欢喜接了”二十两白花花的银子，从此“身上渐渐光鲜”。这是二十两，有二百两呢，他就冒坐牢之罪，潜入学道考场，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一个秀才。他拿这钱，典房、娶妻、生女，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评），他迅速飚升，混到京城，模仿戏文里的蔡伯喈，谎称并未娶妻，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帽儿光光，当上给事中的甥婿。他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拥着“瑶宫仙子，月下嫦娥”得意忘形的时候；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地送死了！”

人变成“非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既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不堪入目。匡超人一反原本淳良的天性，仅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叛卖恩师马二先生；不但不顾念有恩于己、同案而落网的潘三，反倒振振有词地宣称，“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他唾沫四溅、得意忘形地吹嘘：中原五省读书人家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料当场被人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称先儒神位！他还死撑面子耍赖狡辩，结果越描越黑。凡人该有羞耻之心，一旦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良知已经泯灭，是不折不扣的无耻，十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功利心失调于社会，便会形成弥漫于社会的势利之风。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金钱。势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权钱，自古以来就是这两样东西作祟。势利作为观念形态是传统社会中等级体制结构的丑陋投影。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不是把人当人来对待。只

重权、钱不重人，不重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使人成为权、钱的奴隶，造成不是由人来支配权钱，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格贬值，人的尊严贬值，最终就是使大写的“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这就是异化。

鲁迅塑造的阿 Q 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是同一个人，但因“势”和“利”大变，他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水面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虾蟆还能想吃天鹅肉，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虾蟆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有尊严的人。范进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范进什么变了呢？是地位，胡屠户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功利心失调失范失控后，不是一般地“倨”和“恭”，而是“倨”得可恶，“恭”得肉麻。“恭”得肉麻就表现出一种奴性，所以奴性便成了势利的影子。在有权有钱的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势利小人缺少对大写的“人”的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是一副贱骨头，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

话说回来，或潜或显地受功利的驱使而动，这是芸芸众生的常态。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六届莱茵省等级会议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二版第 187 页）。可以说，利益驱动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不仅在人类以往的历史里它起作用，就是在人类历史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将起作用。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正面效

应、激励效应,过早地废止它会阻滞历史的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要充分认识它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功利心失调,就会心理失衡,人格分裂,心态失常,性情扭曲,人性异化。

人被变成“非人”,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都难免产生功利心、势利眼、正常人性被异化的精神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不受势利的支配,不受利益的驱动,按照人的善良本性自由地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这目标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是否向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前进。我们也要以此为指归和方向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

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体制还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必须在调控上狠下大功夫。整个社会的调控是个系统工程,《儒林外史》提倡礼乐文明、仁政等等,此不具论。《儒林外史》着重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在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的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作为个体的人,要经营好自己的精神调节,精神超越。《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作为矫世变俗的处方,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处方有进步性

儒家并不一概否定功名富贵。儒家认为“士志于道”,应当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以道自任,整个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这样,在出仕的问题上,所当考虑的应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害,即所谓“忧道不忧贫”,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依归。儒家愿意接受“必其道得之”的富贵。是“出”还是“处”,是取富贵还是守贫贱,都有个根本原则,都取决于能否行道。讲究“文行出处”成为正统儒家最基本的伦理原则,成为“真儒”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操守,不可舍弃原则和丧失操守而去一味追求功名富贵,因此作品写庄绍光“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

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就是调节功利心的一剂处方。既然等级结构以及考试制度改变不了,为避免其负面效应,就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他也考童生、考秀才,坐馆教书,过着安贫乐道的乡村教师生活。古人很推崇“孔颜乐处”: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周敦颐说,因为他心中有至高的“大”,也就是“道”,人生有这个大目标就会达到与道为一包罗万象的和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乐在处于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内心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物质上相对的困乏不足以影响这种高级享受。这已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体验了——虽然清贫,但是在奉行自己的“道”。虞博士就是这样,中举以前,他也是过着像周进那样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而他安贫乐道,心泰无不足,安祥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虞育德四十来岁中举,他与范进在得知中举时的情感表现又是鲜明的对比:范进喊着“噫!好了!我中了!”感情偏于一执,失去平衡而发疯;虞育德听到报喜,非常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当了,托祁太公打发报录的人。”没有欢喜得失去平衡和谐。他以理节欲,以理节情,不亢不馁,永远保持精神的平宁安详。这种乐天知命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称为“天怀淡定”。卧评说必须“读书十年养气十年”方能臻此境界。其实,读者也只有臻此境界,才能读懂虞博士。

针对功利境界,虞博士的天怀淡定,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有可以汲取的合理因素。吴敬梓把他悬为一面镜子,来照射等级结构中争权逐利、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虞博士怎么就能摆脱周进、范进的那种精神状态呢?这需要一种超拔的精神,把知识分子的精神超拔到一定高度。虞博士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修养功夫,这是作者为超越世俗功名、超拔世人的灵魂而探求的一片精神家园。如果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而痛哭,就不会寡廉鲜耻。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制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就需要保持人际的和谐,保持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人内在身心的和谐(也就是自我的和谐)。